

“这也许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来义乌”

◆史海钩沉

◆李艳



7月，一瀨敬一郎在义乌。楼冀阳 摄

还是当年的发型，只不过头发花白了；还是当年的干劲，只不过步履蹒跚了；还是当年的儒雅，只不过脸上写满了沧桑。

在浙江省历史学会主办的“历史之殇·未来之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义乌现场，遇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原细菌战跨国诉讼原告团日本律师团事务局长一瀨敬一郎，感觉格外亲切。他和原细菌战跨国诉讼原告团团长、浙江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抗日战争史研究会会长王选一起坐在主席台上，会议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走过去打招呼：“还认识吗？”一瀨敬一郎竖起大拇指，笑笑，连连点头。

一瀨敬一郎还在我的采访本上用中文写下细菌战跨国诉讼原告代表王锦悌、王晋华等名字，幽幽地说：“他们人很好，可惜都已不在人世了。我要在义乌多住几天，这也许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来义乌。”

我莫名地感到伤感。王选也已年逾古稀，74岁的她依然思维敏捷、斗志昂扬，走路带风，看起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很欣慰在现场看到杭州师范大学、丽水学院医学院等来自全省各地高校的青春面孔。

活动现场，一瀨敬一郎一直举着摄像机、照相机、手机，左右开弓，全程拍摄，舍不得错过一个场景、一个人、一句话。青春气息洋溢会场，细菌战调查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事业薪火相传，这该是“也许这辈子最后一次来义乌”的一瀨敬一郎最感欣慰的吧？

初相见

侵华日军后代帮中国人打官司

一瀨敬一郎出生于日本熊本县，是侵华日军后代，父亲1941年中断大学学业被强征入伍，参加过湖南衡阳和广西桂林战役。一瀨敬一郎从不回避这段历史，当天在发言时，也坦然提到了父亲的经历：“上初中前，我就知道了父亲参加侵华战争的事情。小时候，看见父亲洗澡，腰上、手臂上都有伤口。当时，我太小，具体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不用问也知道，父亲在中国干了什么。”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一瀨敬一郎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毒气面具，“再也不用不到了吧”。战争折磨了中日两国人民，一瀨敬一郎父亲的这一举动，

把对战争的厌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1945年8月—1946年6月，一瀨敬一郎的父亲在湖北省黄梅县的一个村子里度过了近一年的战俘生活，后被遣返回到日本。

一瀨敬一郎在我的采访本上，画了其父亲战俘生活的详细地理位置图。他说，小时候没有自己的思考，长大后有了自己的思考，非常懊恼，觉得对不起中国人民。

这也是一瀨敬一郎30年来，坚持免费帮“二战”中受害的中国人打官司，状告日本政府的原因所在。

一瀨敬一郎第一次因日本战争责任问题来到中国是在1995年，参加在哈尔滨举行的细菌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哈尔滨的会议彻底改变了一瀨敬一郎的一生。其间，日本和平运动同仁森正孝、松井英介在会上报告了他们赴义乌崇山村的细菌战鼠疫调查，提到村民向日本政府提交了联合诉状，要求谢罪赔偿，可是日本政府没有丝毫理睬。一瀨敬一郎隐隐知道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罪行，但没想到罪孽这么深重。

“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国家。一个否定历史、欺骗民众的国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从哈尔滨回到日本，一瀨敬一郎下定决心，要凭借自己的法律专长，帮助中国受害者讨回公道。

常相聚

义乌变化大得惊人，实在太大了

一瀨敬一郎告诉我，1995年至今，他来义乌少说也有30次，感慨“义乌变化大得惊人，实在太大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到义乌的情景。

“1995年12月，在王选带领下，我和日本民间调查团成员一行20多人联合到义乌调查取证。”一瀨敬一郎回忆，那次在义乌住了三个晚上，其中一天去了崇山村。

崇山村不仅是日军细菌战实战攻击、造成鼠疫大规模流行的受害地，日军1644细菌部队调查班还对患鼠疫的村民进行人体解剖，并放火焚烧村庄，崇山村受害之惨烈令人痛彻心扉。《义乌市志》记载，侵华日军在义乌实施的细菌战，造成1318人感染鼠疫死亡，仅崇山村就有404人遇难、23家绝户。

“说实在的，去之前，我非常紧张。”让一瀨敬一郎没想到的是，碰到的每个崇山村村民都非常友好、热情，一瀨敬一郎和同

伴一个劲地感慨：“我们好幸运！”

调查取证分组进行，以一名律师、历史学者、医师为各组采访人，其他成员分别加入某一组，做笔记、录音、摄像，每组配备一名翻译。当晚，小组成员把白天采访的录音、录像整理成文字，律师根据文字的内容，第二天再进行补充采访，反复确认细节……

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陈列着一张日本《朝日新闻》1942年6月3日刊登的照片：三名戴着面具、身穿防疫服的日军士兵，抬着一名濒死的鼠疫病人。

这份珍贵的《朝日新闻》是日本著名的和平反战人士、细菌战化学战历史研究专家奈须重雄捐赠的。早在1999年左右，在东京从奈须重雄那里看到这份刊登有照片的《朝日新闻》，一瀨敬一郎非常震惊。

“在提起诉讼之前，我多次听村民们讲述当年鼠疫流行时的经历。日本军队来到村庄时，会脱掉村民的衣服进行身体检查，有些村民还被注射了东西。与村民接触的日军军人都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手套和口罩。此外，周围被持枪的士兵包围，山丘的高处还架着机枪。”一瀨敬一郎回忆，在义乌调查时听到村民的反映，由于当时距离事件过去了半个世纪，他对日本军人穿着白大褂的说法是否真实存有一些疑问。然而，在提起诉讼两年后看到这张照片时，一瀨敬一郎确认了村民们的说法是真实的。看到细菌战部队残暴的样子，一瀨敬一郎为日本的战争责任深感羞愧。

在义乌期间，一瀨敬一郎一行广泛和各行各业的人交流，尤其还和义乌的中学生交流，充分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友善。此次义乌之行，让一瀨敬一郎进一步坚定了和王选他们一起打细菌战跨国诉讼官司的决心。

经过近两年的证据筹备工作，1997年8月，义乌、江山、衢州、宁波，以及湖南常德的108名细菌战受害者组成原告团（后增至180人），推选崇山村后代王选为原告团团长，正式在日本东京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此后8年间，历经一审、二审、三审，开庭、败诉、申诉的循环，王选等原告团没有放弃，一瀨敬一郎等日本律师辩护团也从未言退。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首次认定了日军实施细菌武器攻击的历史事实和日本政府的国家责任，但驳回了中国原告方要求谢罪赔偿的请求。原告方不服判决，向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2005年7月19日，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对日本细菌战历史事实等的认定，仍然驳回原告方关于谢罪赔偿的要求。原告方继续上诉至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发布三审决定，拒绝了原告方的上诉，事实上维持了东京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对日本细菌战历史事实等的认定。

这是中国成千上万的日军细菌武器攻击受害者迄今唯一一起对日受害索赔诉讼。这场诉讼改写了战后历史，日本最高法院全面认定的日军细菌战的历史事实，进入了日本学校的教科书。

最相思

要联合起来发出声音，反对战争

一瀨敬一郎有多想念义乌？采访中，一瀨敬一郎直言不讳：“2023年—2025年，我两次

应邀到湖南常德参加细菌战研究等学术活动，其间，非常想来浙江，尤其是义乌。”

一瀨敬一郎的妻子是一位温柔、贤淑的女子。本世纪初，细菌战跨国诉讼一审最后一次开庭，我赴日本东京采访。一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和王选、一瀨敬一郎等一起参加集会、游行，还穿过迷宫一样的地铁，连夜到一瀨敬一郎家中，商讨第二天开庭的相关事宜。

在一瀨敬一郎家中，大半天没有进食的我低血糖，冷汗直冒，但仍强撑着，照常采访、记录。细心的一瀨敬一郎的妻子看出了我的不适，连忙上前嘘寒问暖，并烧了一碗青菜虾仁泡饭，热乎乎吃了，我一下子就缓过神来。

这碗热腾腾的青菜虾仁泡饭，连同一瀨敬一郎妻子温暖、善良的面容，一直铭记在我心中。

我向一瀨敬一郎打听其妻子的近况，他在我的采访本上郑重写下妻子的名字：“一瀨三和，2019年8月26日去世，享年70岁。”

深入骨髓的悲伤，淹没于平静的表情。我讲起了当年的青菜虾仁泡饭，一瀨敬一郎笑了，所有美好的回忆奔涌而来。

一瀨敬一郎没有孩子，两个妹妹住在神奈川县，父亲去世后，他一直和今年100岁高龄的母亲住在一起。百岁母亲仍见支持他的事业，此次中国行所到之处，一瀨敬一郎都会给母亲发所见所闻的照片、视频，两人互动频繁。

细菌战跨国诉讼画上句号近20年后，一瀨敬一郎仍在四处奔走呼号。当天，大会发言，一瀨敬一郎呼吁：“中国的受害者和遗属千万不要因为诉讼结束而沉默，要持续发出声音。如果沉默，那就如日本政府所愿了。中日要联合起来，发出共同的声音：反对战争。受害者们必须进一步团结起来，继续追究日本政府对细菌战问题的责任。”

很多时候，一瀨敬一郎是孤独的。曾有日本媒体记者问他：“作为一个日本人，这么多年，你坚持不懈地帮助中国人，去告自己的政府，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能让你如此坚持？”

一瀨敬一郎的回答掷地有声：“我在学生时代就认识到世界和平运动非常重要，同时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当我成为一名律师后，就很自然地参与到和平运动中来。能帮助中国受害者站上日本法庭，控诉日军的暴行，堂堂正正地要求道歉和赔偿，是一件值得花费任何代价去做的事情。”

临别时，我送给一瀨敬一郎两份特别的礼物：一盒绿茶，一册中华书局最新出版的《金华档案馆藏日军细菌战及疫情档案汇编》。该书为金华市档案馆、东阳市档案馆、义乌市档案馆藏日军细菌战档案，主要为日军在侵略浙江发动细菌战时，民国浙江省政府与上下各级政府机关的各类电文、信函、指令、训令、报告、呈文、会议记录、疫情统计表等，为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造成地方恶疫流行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一瀨敬一郎如获至宝。书很沉，即将赴日留学的志愿者翻译张索恺热心地想帮他拎，他一推推开，紧紧护在胸前……

一头白发的一瀨敬一郎拖着沉重的行李，回到日本已有些时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但愿不久的将来很快再相见。

时光里的诗人

◆心香一瓣

◆赵琼

清晨五点十五分，厨房里传来轻微的碰撞声。那是母亲在淘米，水珠溅落在不锈钢盆底，发出细碎的声音，像一串省略号。我躺在床上数着这声音，知道再过三十分钟，粥香就会漫进卧室——这是二十年来从未改变的时间刻度。母亲的那只老式上海牌手表早已停摆多年，她却能精确掌握火候，让米粒在恰到好处时刻绽开成花。

母亲计算时间的方式很特别。她不用日历，却记得每个重要日子。立夏那天清晨，她必定会煮一锅蚕豆饭，青豆与糯米在柴火灶上交融出翡翠般的光泽；霜降前后，她会拍晒了三个晴天的桂花收进玻璃罐，琥珀色的糖浆里悬浮着细碎的金黄。这些时令食物是她写给季节的情书，用味道记录光阴的流转。

我十岁那年出水痘，体温计显示39.5℃。母亲把毛巾浸在井水里拧干，敷在我额头上。每隔十五分钟，家里的老式座钟敲响一次，她就来换一次毛巾。深夜的钟声格外清脆，我数着“当当”声，在朦胧中看见母亲俯身时垂落的发丝，被台灯镀成淡金色。后来我才发现，那个座钟其实慢了七分钟，但母亲换毛巾的间隔却分秒不差——她用自己的心跳在计时。

衣柜最底层有个樟木箱，里面整齐码着我从小到大的毛衣。最上面那件鹅黄色的开衫，袖口还留着我的牙印。母亲每年惊蛰前后都要把毛衣搬出来晾晒，阳光穿过编织的孔隙，在地板上投下蜂窝状的光斑。她总是一边拍打毛衣一边说：“这件是你五岁生日穿的，那天下着小雪，你非要戴着毛线帽吃蛋糕。”她说话时手指抚过毛线凸起的纹路，仿佛在阅读时光留下的“盲文”。

端午节前半个月，母亲就开始准备粽叶。她把青翠的苇叶泡在搪瓷盆里，水面上漂着几粒浮萍。每天清晨换水时，叶片相互摩擦发出沙沙声，像春蚕啃食桑叶。母亲说苇叶要泡足时间才能柔软适度，她不用看日历，只要闻闻水汽里泛出的植物清香，就知道何时该裹粽了。蒸笼冒起白气时，整个厨房都弥漫着时间的醇香。

母亲有个巴掌大的铁皮盒子，装着各色纽扣。每当夜深人静，她就坐在灯下缝补衣物。顶针划过布料的声响，与窗外蟋蟀的鸣叫形成奇妙的二重奏。我常见她对着灯光穿针，丝线在空气中划出细亮的弧光。那些补丁后来都成了时光的邮戳——膝盖处的猫头鹰图案是我第一次爬树磨破的，袖口的红色星星是参加朗诵比赛前连夜缝上的。

去年冬天，母亲突然住院。我在她床头柜发现一本老旧的《新华字典》，里面夹着许多树叶书签。枫叶旁边写着“小满，女儿会背《悯农》了”；银杏叶下记录着“秋分，女儿考上县中学”。这些褪色的字迹组成一部私人编年史，比任何日记都更鲜活。护士来换点滴时，母亲正望着窗外发呆，夕阳把她的白发染成暖橘色。她忽然说：“梧桐叶落第三十二片的时候，你爸爸就该回来了。”

现在每次回家，都能看见母亲在阳台上摆弄她的“时间仪器”：养着睡莲的陶缸是夏季的湿度计，挂着的风干玉米能预报秋雨，窗台上的薄荷长到第七片叶子就该摘来泡茶。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在她手里都成了丈量光阴的标尺。

昨夜阵雨过后，母亲把受潮的老照片铺在客厅晾干。黑白照片上的年轻女子抱着婴儿站在樟树下，树影斑驳如同泼墨。我忽然发现照片角落用钢笔写着“癸亥年四月廿八”，那是我满百天的日子。母亲的手指轻轻点着老旧的相纸，指尖有常年劳作留下的茧，摩挲照片时发出极轻的沙响，像时光本身在低语。

清晨，我又听见厨房传来规律的声响。走进去看见母亲正在揉面，面团在她的掌心旋转出完美的圆形。墙上的光影正好斜切过灶台，把她分成明暗两半。她抬头笑道：“再等三阵风的时间，馒头就能上笼了。”我忽然意识到，母亲才是时光里的诗人——她把分秒写成晨露，将岁月谱成童谣，而我们这些子女，都是她写在时光里的美丽韵脚。



娟子 摄



琉璃千顷